新闻热线：010—58884050
E-mail：changetougao@163.com
■责编 杨 雪
科技日报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玉渊杂谭

电影遇上“互联网+”

文·杨 雪

“新华字典”和“俄罗斯方块”被互联网公司注册，将被改编成影视剧，这样也行？据说在IP电影时代，没有什么不可能。什么是IP电影？就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即知识产权。据说现在“圈里”都不说拍戏，直接说“IP开发”。还不太明白？例如《小时代》系列、《何以笙箫默》这种直接由小说改编，以及《同桌的你》《栀子花开》这种和电影原本不搭界的经典老歌被开发成剧本拍的电影，都属于IP电影。

原来是给“购买成品改编”扣个洋帽子，用概念把影视圈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重新包装一下，值得怒赞！这么说来IP电影可一点也不能算新鲜事，别说国外的《哈利·波特》《指环王》《变形金刚》系列等，就国内，上个世纪不就已经有了《红高粱》《活着》这些“基于IP开发”的成功案例吗？

当然，IP电影的提出是一种对网络时代文化生态的高度关注，其背后依托的是网络文学的粉丝群力量。可惜，资本一旦介入概念并与之纠缠，势必制造大量泡沫。资本追逐IP，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更多的钱，不可能保障创作的时间。没有了内容做支撑，重点便放在了营销手段上，电影艺术则沦为娱乐化工具。然而，大众岂能甘心被这样纯粹地“娱乐”？

“互联网+”之于电影产业，应该是精益求精的制作技术带来更震撼的视听体验；是从受众心理出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票房及口碑而不断提升出品质量；是借互联网思维搜罗各方创意和智慧以创造出更多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大众文化……而绝不是囤积版权、炒作价格，在IP概念里捞一票算一票。实际上，错不在电影遇上了“互联网+”，而在于如何让电影遇上“互联网+”，说到底，都是活动于其间的人。

如果电影的商业属性凌驾于文化属性之上，甚至以压倒性态势而广泛存在，那么电影和电视的区别在哪里？仅仅在于银幕和荧幕的承载方式吗？电影是产业，也是艺术，产品会随时间奔流入海无影无踪，艺术品却永远扎根于时代坐标在风雨里招摇。回忆今年看过的电影，大多数已经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而出于补课目的在线观看的《罗马假日》，情节依旧清晰在目。所以我总觉得，作为电影人，能站着挣钱是翘楚，挣不到钱还站着是风骨，跪着挣钱是市侩，挣不到钱还跪着就是……没法说了，还是那句话，做电影总该有些情怀。

■人物纪事

胡适不做自了汉

文·魏邦良

朱少华绘

关于择业，胡适特别强调兴趣的重要性。

不过，即使你对从事的工作充满兴趣，要想成功，还得有天分，肯努力。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绝顶聪明的人，又肯下笨功夫，方可成功。

胡适晚年对秘书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有天分，肯努力，但所处的环境不佳，那么，绝顶聪明者，渐渐也会失去学习的激情和追求的热望。结果，再聪明的人，在环境的限制下，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胡适堂叔胡近仁就是一个例子。

胡近仁虽是胡适的堂叔，但两人年龄相仿，早年读书时，两人成绩相当，交往密切。胡适后来赴美留学，又入北大做教授，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学术明星。胡近仁一辈子没走出家乡那巴掌大的地方，一直“矮人国里做王”。既无竞争对手，又乏切磋同伴，环境闭塞，信息不畅，久而久之，激情与斗志消融于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中。一个才思敏捷饱读诗书的少年，长大后，于学术上竟毫无建树。

即使天分高，肯努力，又身处绝佳之学术环境中，所取得的成绩也不一定尽如人意。

在胡适眼中，赵元任天分极高。他和胡适是同届庚款留美生。赵元任的成绩是第二名，远远高于第55名的胡适。在送给赵元任的一帧相片中，胡适于相片背后题写的一段话寄寓了他对赵元任的热切期待：

“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但由于赵元任兴趣太广，人到中年后，他取得的成就与胡适对他的期待不能相符，胡适充满惋惜地感叹：“元任是稀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

胡适本人似乎也重蹈了赵元任“博而不精”的覆辙。

胡适弟子唐德刚对老师因兴趣广泛而耽误学术感到惋惜，埋怨老师“捞鱼摸虾，误了庄稼”。确实，胡适的学术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对胡适对读者对中国的学术界而言，都是令人扼腕的憾事。

或许，顾颉刚是个正面的例子。

刚步入社会，顾颉刚就意识到自己只适合做学问。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我的性情只适于研究，不适于服务，亦不适于教育。故商务之事我固不愿做，即北大研究所之事亦未尝愿做。我所以渴想回京之故，一来想避去家庭，二来想治愈湿疾，三来为参考与问业的便利。”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同学。后来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历史系时曾请顾颉刚去做教授，相处一段时间后，顾颉刚对傅斯年忙于政务荒疏学术颇有微词。在给胡适的信里，他恨铁不成钢地说：

“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才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

胡适认为“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会毁了一个人。顾颉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大做教授时，顾颉刚薪水不低，地位亦高。但他却想尽办法离开那里重回北京。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

在给胡适的两封信中，他都提到这一点。

“到了广州，在小鸡里做凤凰，甚怕有堕落的危险。……故薪金虽多，亦不留恋了；学生虽依依，也顾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脱离广州，回到北平，即是‘宁为牛后，毋为鸡口’的意思。因为北平前辈甚多，青年们骂不到我，也捧不到我，容许我安心读几年书，打好我学问的基础。”

正因为心无旁骛，学有专攻，且一直身处学术中心北平。顾颉刚的学问与日俱进。仅从学术建树来说，顾颉刚后来居上，不仅把傅斯年甩在身后，甚至超越了老师胡适。

虽然顾颉刚的学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老师胡适。但从社会贡献这方面看，他远远不如身兼多职热衷公共事务的胡适。

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历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外交、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顾颉刚望尘莫及；胡适办过报刊，四处演讲，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付出的努力，顾颉刚也难望其项背。

胡适投身公共事务，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因为他责任心强。一腔热血使他常常走出书斋，荒废了学术。一次，为办《独立评论》，他夜里十点写文章《信心和反省》，直到凌晨四点才完工。妻子江冬秀心疼丈夫，责怪他不爱惜身子。胡适回答：“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给《独立评论》，不能说是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但心里总觉得这一天是我尽了一点公民义务的一天。所以我每到两三点钟上床时，心里总觉得很好过；若是那一天做了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心里更快活了。”

可知，胡适学问的“不长进”，正是他为国家为大众所做的牺牲。我们为此惋惜可以，但不能责怪，而应敬佩。

那么，胡适为何能牺牲自己的学术投身公共事务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虽热爱学术，但也有“不做自了汉”的志向。

胡适父亲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上海的张焕纶先生。张焕纶教人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胡适的为人处世受这句话影响颇深。

1935年7月3日至7日，胡适带着次子胡思杜，和任叔永、陈衡哲夫妇等人，作平绥路全线旅行。火车上苍蝇多，胡适和儿子比赛打苍蝇，还赋诗一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莫作自了汉。

儿子那么小，胡适就向他灌输“莫作自了汉”的思想。

倘若躲入书斋，精研学问，那么，学术成就再大，也不过是一个胡适不屑为之的“自了汉”；现在，他牺牲自己的学术，为国家、民族、大众付出更多的心血，虽然自己的著作不少成了烂尾楼，但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不是一个“自了汉”所能比的。

安于书斋，倾心学问，像顾颉刚这样一心搭建自己的学术大厦，固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而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像胡适这样不做自了汉，更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而我要说，胡适不做自了汉，虽瘦了自家的学术之树，却肥了社会的公共之果。

■艺苑

九寨精灵（摄影） 刘引玲

■影像空间

众神的市场

文·徐 耀

PK是部电影，也是男主人公的名字，也是时髦的日常用语“挑战”。一语双关，PK这个外星人在地球上发现了什么？急于离开乱糟糟的地球的PK最终PK了什么？

PK说“世界只有一个神，造物主，而我们对造物主一无所知。其他各种各样的神都在发送错误号码”。为了找到被毛贼抢走的导航仪，PK拜倒在印度可以找到的所有神祇脚下，发现毫无用处，而号称印度教大法师的Tapasvi却把PK的导航仪当作神物来骗取信徒的捐款。在Jaggu的安排下，PK挑战了已有的众神，包括上帝、真主、湿婆、耶稣、佛祖等等。实际上，PK挑战的不是这些神，而是这些神背后的宗教力量，宗教力量依靠这些偶像神得以生存，神是民众从外界获得心理安慰的媒介，而民众就是神的市场。因为世界上宗教种类繁多，信仰不同宗教甚至相同宗教不同派别的群体就是众神争夺的市场，这种市场的争夺和动物界领地的争夺相似，你死我活。

讨论有神无神、神是哪位，是个乏味的事情，中东和欧洲为了后者打仗一千多年，中国和西方为了前者对立数十年，谁也不能说服或者战胜对方。还是外星人PK说得对，没有神，只有造物主，而造物主是啥？没有人知道，当然，除了中国人。道家认为，道生万物，那么道就是西方人所谓的造物主，按照现代解读，道是自然法则的总称，如此造物主当然不是神了，因为不可能具备人的形体。唉，这个道理老子早就提出来了，可是世界依然在众神的争夺下混乱不堪。PK挑战了众神通行千年的做法：膜拜我，我就保佑你。PK认为，人类应该互相帮助。

何止宗教会让民众变成众神的市场，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都有可能。比如，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虽说只是一种政治经济理论，但也按照宗教的方式在和其他主义争夺市场。国内有些人向民众兜售自由民主主义，其原因在于，掌握这个主义的国家目前比较强大，就像宗教里比较灵验的神，皈依它有可能一时获得“神的眷顾”，但现实很可能会让人失望，正如电影中PK所说“假如你的家人生病了，你应该去给他治疗，在身边照顾他，而不是去按照Tapasvi大法师的建议去八天路程的一个地方找一座庙宇”。这正好对照中国目前的情形，我们的文化生病了，政府应该照顾自己的人民，让他们的思想和文化康复，而不是去给自由民主这个“神”上香。

虽然是一部电影，但PK挑战了我们的常识，而我们就是被常识所困扰，被众神的市场所束缚。突破这种桎梏，就意味着思想解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慢慢新理论会成为新的“神”，民众会再一次沦为“新神的市场”。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轮回，也有人叫做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语言系统有根本性缺陷。

在他的星球上，PK们没有名字，交流不需要语言，握手就可以把思维传递过去，这是个奇妙的想法。没有语言做媒介，交流不会产生歧义，人们就不会发生误解，这样战争就可以避免。令人遗憾，人类不仅需要语言，而且语言繁杂，人类的交流始终是个大问题，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有此原因。非但如此，人类甚至还要利用语言来掩饰真实想法，那能不出问题吗？

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敌对甚至战斗了几十年，难得在这个电影中看到希望宗教和解、民族友好的期盼。其实，印巴分治就源于英国殖民者搅乱了神的市场，而两国统治者乃至民众都茫然不知。属于不同的市场，不同的神会保佑他的信徒吗？开始没有，后来有了，因为PK揭露了神的虚伪。

引人发笑，却又蕴含深意，这个电影自《三傻大闹宝莱坞》后再一次引发印度社会的激烈评论，甚至有宗教领袖要求禁播，但票房说明了民众的选择。古老的印度背负着沉重的种姓桎梏、宗教冲突等负担，发展得艰难。我们何尝不是呢？雅利安人的南侵给印度留下了种姓制度、促生了佛教，而佛教东传又改造了中华文化、促生了理学，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众神市场的交错，刻画了历史的轮廓。我们如今需要突破什么？对他国经验的崇拜。人民要互相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面向未来的中华文化，我认为，应该是共产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接。

■乐享悦读

蔚为大观的食物文化史

文·姚人杰

西谚有云：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食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可推敲下来，温带热带地区的古人可以不穿衣服，可以住在山洞，可以少出门当原始宅人，但唯独少不了进食喝水。所以，“衣食住行”四种需求里面，“食”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

食物如此重要，也难怪有家英国出版社Reaktion图书公司从2008年开始出版了一系列以食物为主题的文化史趣味书籍，目前共出版了51种，而且数目仍在不断增加之中。其实，食物文化史类书籍并不鲜见，鹅肝松露等美食，威士忌伏特加等烈酒，胡椒茴香等香料，土豆西红柿等蔬菜就常常成为食物文化史书籍的主角，但阵容如此强大的丛书还是值得瞩目的。而去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吃的全球史”系列三册《冰淇淋》《比萨》《汉堡》便出自该套丛书。

当然，纵观整套书系，虽然题材十分广泛，但绝大多数还是源自西方的食物。列数下来，只有《茶》《咖喱》《椰枣》《饺子》等几种可以勉强归入东方阵营。虽然这固然是因为出版社难以找到了解东方食物的专家，但难以否认的是，虽然韩国泡菜、日本寿司已经在很多国家都受到欢迎，可是多数消费者还是以尝鲜的心态试之，与汉堡包、三明治等食物在全球取得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笔者倒是在心中揣想，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式食物是否会进一步走出国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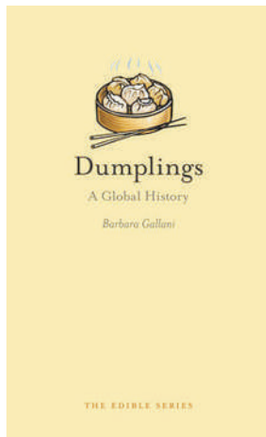
先来说说2015年3月出版的这本《饺子》（Dumplings），虽然封面上印的图案像是中式蒸笼里的蒸饺，但假如把Dumplings直接理解成“饺子”，无疑会模糊掉这本书的本意。作者芭芭拉·加拉尼特地用了一整章来解释“什么是dumpling？”这个难题：探究dumpling这个词汇的来源的话，可以追溯至16世纪，与词汇“面团”（lump）有关。dumpling的种类繁多，任何一种官方定义都很可能仅能部分形容出它是什么样的食物。寻找通用定义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英语里的“dumpling”这个词被当成翻译捷径，用来描述众多具有相似特色的食物，可那些食物有着十分明确的身份，在它们所来自的国度语言里有着十分明确的叫法。譬如，意大利的土豆饺子、方形饺；中国的馄饨、饺子、包子；中亚国家的烤包子；中欧的马铃薯丸子；德国面疙瘩；波兰饺子；日式煎饺、肉馒头；土耳其饺子；这些统统都可以被归于“dumpling”之列。这本页数不到150页的小书最后附上总计10页的词汇表，列举了世界各国的“饺子”。

世界各国“饺子”使用的原料也与所在地区大有关系，譬如北欧人常常使用土豆，在英国、意大利和中国会使用小麦面粉，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木薯和黍米就成了制作“饺子”使用的原料。而随着全球人口的迁移，移民们开始使用身边易获得的原料，同时也会分享配方，使得“饺子”发生了变化。

这些各式各样的“饺子”可以做得精致高档，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寻常百姓家的食物。各类饺子的包制往往需要多人合作，常常是全家上下一起协作，于是，“饺子”与家庭活动有了紧密的联系。

作者芭芭拉·加拉尼是意大利人，她对于儿时做饺子的记忆是这样的：“圣诞、复活节、万灵节之类日子的重要家族聚会之前那天，奶奶的厨房会变成一条生产线。家族里所有的妇女和女孩——包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我的妈妈和她的妯娌，我的五个堂姐堂妹，还有我——会穿上围裙，卷起袖管，开始给土豆剥皮、揉面粉、切肉、做意大利饺子。到了那天黄昏时，会有几百个饺子搁在托盘里和大理石案板上，准备第二天下锅，到时候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煮好。这种传统并不是意大利独有的，我发现我的童年回忆能让我遇见的许多人产生共鸣，特别是假如他们来自波兰、中国或犹太家庭的话。”

“饺子是温馨的家庭食物，花费甚少，日常普通，或许谈不上激动人心，但肯定很好吃，能填饱肚子，让吃的人觉得舒服。”芭芭拉的这番描述无疑道出了各国“饺子”的最吸引人之处。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1.50元